

淞滬會戰75週年析論 日軍作戰線改變

作者 前國防大學副校長兼戰爭學院院長退役中將 張鑄勳

提 要>>>

- 一、淞滬會戰為我國決定全面抗戰所發動的第一次大會戰，也是犧牲最為慘烈，影響最深遠的一次會戰。會戰的評述，名家輩出，立論精闢；惟對日軍侵華的作戰線，從由北向南改變為由東向西，是否由於國軍的主動先制，導引日軍追隨我軍行動所造成，至今仍有不同看法。本文旨在探討此一問題，期能闡釋歷史真相。
- 二、國軍發動淞滬會戰，在政治上，為激勵民心士氣，促進國內團結及影響國際觀瞻；在軍事上，為誘迫敵軍增援華中，擴大戰事，導引其主作戰線從由北向南改為由東向西，以利持久戰。日軍為情勢所迫，陸續調動兵力增援上海，造成中日雙方的主力都集中到淞滬地區。會戰後，日軍為擊滅國軍主力，打通華北與華中的連絡線而發動徐州會戰；此際，在華日軍總兵力的三分之二已被誘至華中地區，爾後乃乘勢由東向西沿長江仰攻武漢。
- 三、國軍在淞滬會戰的作為，係沿自於東征、北伐時期，主動先制的軍事思想及調整作戰線等實戰經驗所啟迪。相關文獻證實國軍爭取主動，改變日軍作戰線的構想，從民國24年開始醞釀，25年定為戰略，26年在上海付諸實施，前後歷時兩年。

關鍵詞：淞滬會戰、作戰線、抗日戰爭



前言

抗日戰爭是中華民族「地無分東西南北，人無分男女老幼」，團結一致抵禦外侮的反侵略戰爭。民國26年7月7日日軍引發「盧溝橋事變」，隨即占領平津，國民政府決定全面抗戰，選擇從上海反擊日軍的侵略而發動淞滬會戰，迄今已歷75週年。這次會戰是我國從華北地區性的作戰，邁向全面對日抗戰的第一次大會戰，也是抗戰全期犧牲最慘烈的一次會戰；在扭轉戰略形勢，激勵民心士氣及促進部隊團結上特具意義，影響至為深遠。對國軍在淞滬會戰時，是否曾經以主動先制的作為，迫使日軍將侵華的作戰線從原來對我威脅最大的由北向南沿平漢線進攻武漢，改變為由東向西沿長江進攻武漢？是在開始抗戰之前就已經有這樣的戰略思考？還是在淞滬會戰開始時才因勢利導所形成？甚至於從來就沒有這樣的想法，係戰事逐漸擴大後所自行發展的結果；這個議題各方尚持不同看法，咸認為這麼重大的事，在會戰的原始文件或相關資料中都欠缺具體記述，而持信史不足的疑惑。本文旨在探討此一問題，期能增補相關論述的不足，解釋歷史真相。

李德哈特撰寫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史時，記述公元1943年7月德、蘇兩軍在庫斯克會戰(Battle of Kursk)時這麼寫著：「在追溯任何計畫的原始時，通常都是很難斷定它的影響力究竟是些什麼因素，即

令把所有的檔案都拿出來公開研究，也都不會有可靠的結果，因為一切文件也都很少記載真正的原始原因。所以，歷史對1943年俄國的計畫是如何決定的，也並不能提供任何更確實可靠的結論。不過歷史卻可以顯示出，即令僅只從他們自己的作戰中，蘇俄的戰略計畫作為也一樣可以獲得充份的經驗，使其作成必要的結論。」¹淞滬會戰面臨庫斯克會戰同樣的問題，有些真相從會戰本身甚難釐清。通常作戰計畫為求扼要明確及基於保密需要，僅記述與本次作戰的相關事項，上級的構想也只載明與執行本次任務有關者，其餘概不贅述。改變日軍作戰線是抗日戰爭的全局指導，而淞滬會戰是華中地區的一次重大軍事行動，會戰的相關資料沒有提到作戰線亦屬正常。要解答這個問題，李德哈特提供可行的辦法，認為可從其原始原因，即思想的根源或曾經有過的想法或做法去尋找，也能做出合理的解釋。本文試從這個途徑進行探討，從歷史、理論、旁證資料、作戰經過及經驗等綜合推論，探索真相。作戰經過的分析，以日軍及大陸所編纂的戰史資料為主，佐以抗戰時期的重要日記、回憶錄互相參照，以期求得客觀結論。

抗戰軍興，國民政府以軍事委員會(以下簡稱軍委會)為最高統帥部，蔣中正先生為委員長，行使陸海空軍最高統帥權。²本文以當時的統帥系統，稱抗日戰爭

1 李德哈特(B.H.Liddell Hart)著，鈕先鍾譯，《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史》(Hist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臺北：軍事譯粹社印行，民國68年3月15日)，頁362。

2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國民革命建軍史》第三部：八年抗戰與戡亂(一)(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印，民國82年1月)，頁96。

領導人為蔣委員長。

日軍侵華作戰線

作戰線係大軍作戰時，決定主力作戰的方向線，是戰略目標與後方基地之間，在概念上的一個寬廣空間；沿著這個概念空間，在實體上包括作戰地區地形和後勤廠庫設施，作戰地區特性影響戰力發揮，後勤廠庫及相關的水陸交通的補給線提供持續戰力。決定作戰線必須考慮會戰的態勢是否有利，補給線安全及支援能量的穩定；其選擇要分析山系、水系及交通網路對敵我雙方的作戰影響、港口機場分布與聯合作戰的關係、地方政情及資源狀況、後勤廠庫的設置位置及作業條件、全程作戰的安全與警戒等。作戰線綿長的兩側容易受到威脅，如果被敵截斷，則補給中斷，持續戰力難以維持，部隊陷入險境。軍事指揮官對補給線的關注，就像拳擊手在本能上對自己柔軟的腰腹一樣敏感。作戰正面係部隊展開後，面對敵人，準備與敵作戰的正面；作戰正面和作戰線垂直，就如同母雞展開兩翅，保護後面排成一路的小雞。約米尼(Antoine Henri Jomini)認為作戰正面總是要和作戰基地的正面平行，與作戰線垂直，並且兩翼要伸展得夠遠，以便好好保護這條作戰線；³反之，若決戰時作戰正面與作戰線平行，則很容易被敵人迂迴或側擊而截斷，態勢極為不利。約米尼為19世紀末期的一代宗師，其經典名著《戰爭藝術》(Summary of The Art of War)至今仍為兵家所必讀，對作戰線有詳細說明。

戰史上，1812年法俄作戰，法軍以優勢戰力發動攻勢，俄軍運用廣大的國土遂行持久戰，以空間換取時間，消耗法軍戰力，一面積極整備戰力，準備反攻，一面以游擊行動配合主力作戰，實行堅壁清野疲滯法軍。俄軍在作戰全期，作戰正面與作戰線概成垂直，待敵我優劣形勢改變再轉移攻勢取得勝利。這是戰爭史上極重要的戰例，後世的弱勢部隊以持久作戰對抗優勢敵軍，很難說不受法俄作戰的影響，只是因時、因地、因力不同而有不同的指導。

抗日戰爭所面臨的作戰線問題，是我基地在中國西部內陸(如圖一)，日軍若沿平漢線南下，敵我雙方主力將沿平漢線進行南北方向的對抗，則國軍作戰正面與作戰線平行，補給線容易被側擊或迂迴截斷，決戰時將處於極不利地位；且我國的工業生產設施大部分集中在華中，若要遷移到後方基地，武漢是交通中樞，若快速被敵奪取則資材來不及後撤，影響戰爭潛力至巨。國軍若能誘迫日軍主力溯長江向西，將由平原向丘陵、由丘陵向高山仰攻，則敵我形成沿長江進行東西方向的對抗，國軍作戰正面與作戰線垂直，與工業生產設備的撤退路線亦為垂直，利於維護補給線安全及掩護工廠遷移，這是國軍較安全的作戰方向。作戰線的評估及選擇是大軍作戰在計畫階段的參謀作業要項，抗日諸將身經百戰，不可能漠視這個最基本的戰略問題。飽讀中外兵書的蔣百里很早就論斷中日終必一戰，而且認定是長期戰爭，戰場將在平漢線、

3 約米尼(Antoine Henri Jomini)著，紐先鍾譯，《戰爭藝術》(Summary of The Art of War)(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2002年1月)，頁67。



粵漢線以東。⁴其軍事素養深受蔣委員長倚重，民國26年春，又曾奉命考察全國軍事防務，以他的學養和觀察力，會看到這個問題。

日本在日俄戰爭以後的帝國國防方針，對美、對俄、對華都有戰爭準備。對華的作戰構想：「華北方面，必要時以所需兵力登陸秦皇島、塘沽、天津及山東半島，占領河北及山東要地；華中方面，雖在上海附近的長江河岸選定登陸點，但是否在該方面實施作戰，將依狀況而定。其他對浙江、福建及其以南的海岸要地占據，亦策定了有關方案，……對中國的作戰，視情勢有其伸縮性，其中一項，依情況以沿平漢鐵路南下的軍隊與沿長江西進的軍隊相策應，在漢口附近進行作戰」。⁵日本的國防方針披露其侵華重點在華北，華中則視狀況而行。作戰目標遠及武漢，並列舉兩條作戰線可供選擇(如圖二)。

大正十四(民國14)年，日軍參謀本部由作戰課長畑俊六大佐出任團長，編組參謀本部的作戰、要塞及船舶課，陸軍省的當事者，加上海軍軍令部的作戰課部員等，利用軍艦經1個月的時間逐次從上海至漢口偵察其登陸地點。⁶平漢線是陸路交通要道，情資蒐集更為方便，沿線的山川形勢及風土民情必然同樣完成必要調查。由是觀之，日本侵華計畫的策訂甚早，並依此進行戰爭準備。曾經有人懷疑，日本侵華計畫是否曾經考量過作戰線問題，這在其國防方針上給了明確答案，而且在民

國14年就完成現地偵察。

民國26(公元1937)年淞滬會戰時，日軍以兩個師團的增援兵力在杭州灣登陸，是造成國軍潰敗最主要的原因，日軍登陸點的地形及水文，應該在民國14年這次偵察任務就已經完成；27年日軍溯長江發動武漢會戰，對長江沿岸的河、岸資料應該也蒐集完整。日本侵華圖謀甚遠，經營甚久，戰爭勝負取決於準備之日，能不慎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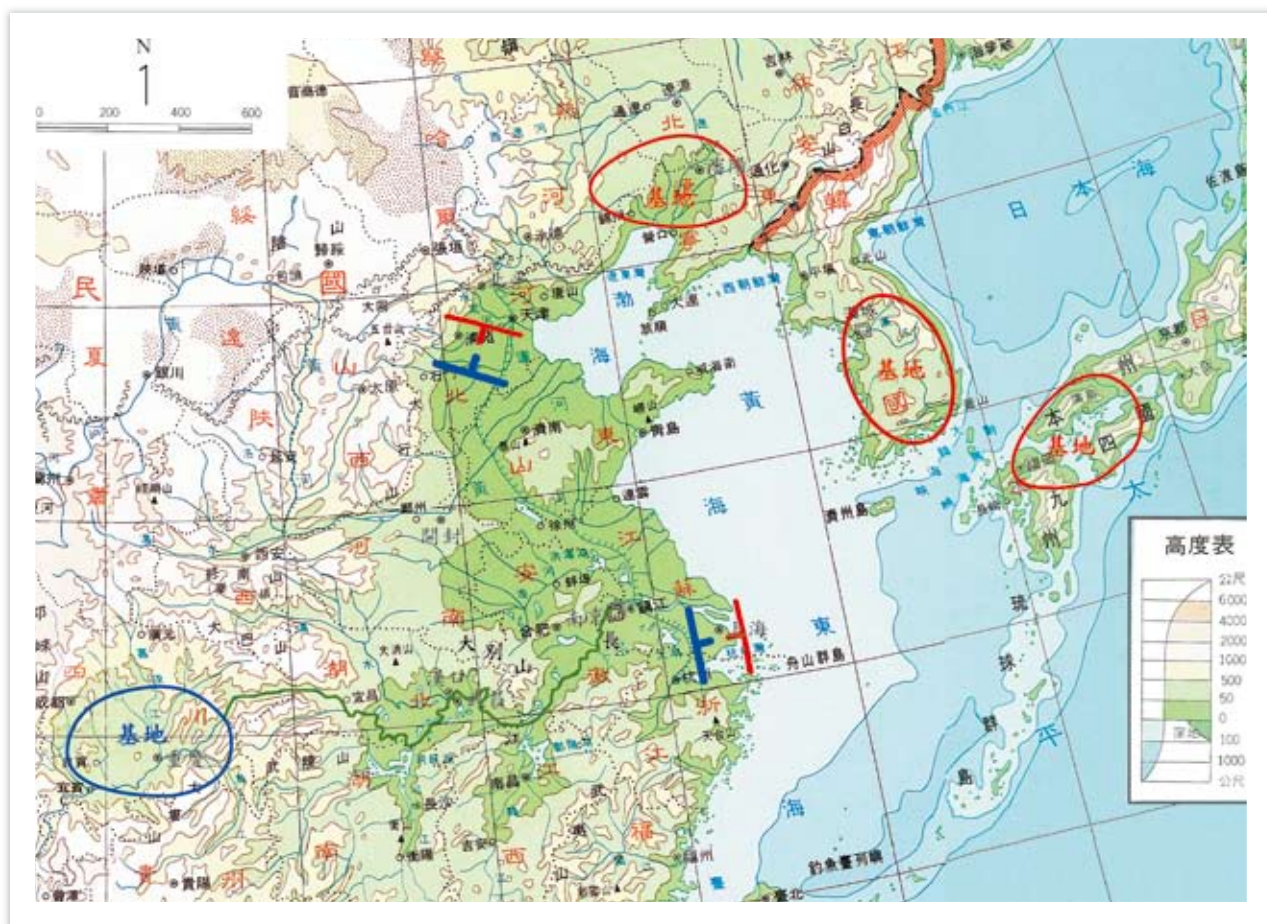
民國以來，日軍侵華由北向南，20(1931)年製造「九一八事變」，占領東北；21年成立偽滿洲國，扶植傀儡政權，並在上海挑起「一二八事變」；22年占領熱河，併入偽滿，控制灤東及長城重要關口，平津門戶洞開；24年占領冀東22個縣市及察哈爾3個縣，成立在其控制下的「冀東防共自治政府」；25年煽動蒙古王公德穆克棟魯普建立「蒙古自治軍政府」，由日軍提供武器裝備及訓練，並在日軍砲兵、飛機支援下進軍綏遠，然為國軍所敗，粉碎其掌握內蒙的企圖；26年製造「盧溝橋事變」，占領平津。從民國20年到26年一路下來，日軍幾乎每年製造事件，占領中國領土，接續由北向南蠶食中國自屬預料中事。日軍主力在北，由北向南取攻勢的態勢自然；沿平漢線南下武漢可截斷中國為東西兩部，則東南精華區盡在其威脅中，藉此逼迫中國談判求和，符合其「一擊」解決的政策。日軍此一行動對我危害最大，無論其集中兵力從一個方向進攻

4 曹聚仁著，《蔣百里評傳》(北京：東方出版社，2010年1月)，頁102。

5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日軍對華作戰紀要叢書，《從日俄戰爭到盧溝橋事變》大本營陸軍部(一)(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印，民國78年6月)，頁403。

6 《從日俄戰爭到盧溝橋事變》，頁404。

圖一 抗戰初期中日兩軍作戰正面與基地關係概見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武漢，或區分兩路沿平漢線及長江分進合擊，其主作戰線由北至南應為最可能行動。國軍的戰爭準備，考量作戰正面、作戰線、基地三者的關係，為爭取主動，產生誘迫日軍改變主作戰線為由東向西的動機並不偶然。

會戰經過與發展

抗日戰爭，日軍主力從華北轉移到華中，從而改變其由北向南的作戰線為由東向西，這樣的結果係經過淞滬和徐州兩次會戰所造成。本文旨在探討造成日軍作戰線改變的關鍵因素。其他與研究主旨無重

大影響的戰術、戰鬥及作戰經過則盡量從簡。

一、淞滬會戰的發動

民國21年上海「一二八事變」以後，日軍即在上海虹口、楊樹浦一帶駐紮。並有艦艇長年在長江、黃浦江巡弋。「盧溝橋事變」以後日軍占領平津，國民政府決定全面抗戰。民國26年8月9日上海的日本海軍陸戰隊中尉大山勇夫與一等兵齋藤要藏兩人駕車往虹橋機場偵察，與該處的中國保安隊發生衝突，大山殺死保安隊員一人，保安隊還擊將兩人射殺。中日雙方進行談判，日方要求我國保安隊退出上海，



圖二 日軍侵華作戰線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並藉口護僑增加陸戰隊人數由3,000提高到7,000，11日後，即有日艦10餘艘停泊在吳淞口外及黃浦江內，衝突的危機升高，軍委會決心從上海發動反侵略戰爭。8月13日第9集團軍第88師向侵占八字橋一帶的日軍發起攻擊，爆發淞滬會戰。開始時雙方兵力不多，但為達到各自的戰略目

的，雙方一再增兵，國軍投入70萬，日軍近30萬。作戰規模不斷擴大，發展為一場歷時3個月，空前激烈的大會戰。

國軍的會戰目的，在政治上，為激勵民心士氣，促進國內團結及影響國際觀瞻；在軍事上，為誘迫敵軍增援華中，擴大在華戰事，並導引其作戰線從由北向南改為由東向西，以利遂行空間換取時間的持久戰。戰事一起，日本內閣於14日的會議決定放棄「不擴大方針」，15日下令編組上海派遣軍，轄第3師團及第11師團前往上海，賦予協同海空軍占領上海及周邊要地的任務。於是日軍在華作戰從原本限於華北的政策，發展成華中、華北兩個戰場。

國軍初期與進據租借區的日軍陸戰隊激戰，由於日軍碉堡堅固，武器精良，國軍進展有限，乃轉為攻擊登陸的上海派遣軍。29日、30日日軍佐世保第4特別陸戰隊增援上海。國軍增援部隊陸續投入戰鬥已達15個師，上海派遣軍實際上處於被分割包圍的不利地位，陷於苦戰，司令官松井石根向大本營請求增援，認為日軍兵力最小限度要5個師團。⁷9月11日其參謀

7 郭汝瑰、黃玉章主編，《中國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作戰記》上冊(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頁543。

本部下達命令，增派第9、第13、第101師團及野戰重砲第5旅團、獨立野戰重砲兵第15聯隊及其他支援部隊增援上海，加入上海派遣軍戰鬥序列；⁸復於10月16日從華北調用獨立攻城重砲兵2個大隊、戰車1個大隊、獨立輕裝甲車3個中隊等，講求一切手段扭轉上海方面的不利戰局。⁹

日軍不斷增兵華中，國軍從各地調集的部隊亦兼程趕赴戰場，會戰規模持續擴大。10月是會戰中戰鬥最激烈的階段，國軍曾組織大規模的反擊未能奏功，日軍亦傷亡頗眾，進展困難。其參謀本部即於10月20日下達臨參命第119號，編成第10軍前往上海作戰。第10軍的編成部隊分別由華北調用第6師團及第5師團之一部，由滿洲調用第18師團，再動員第114師團予以編入，其他軍直屬部隊及兵站部隊之一部均由華北調用；上海派遣軍亦予以加強，兵力從華北調用第16師團、其他軍直屬部隊及兵站部隊等。於是，在上海方面的日軍增加為兩個軍的9個師團，而華北方面的日軍則為兩個軍的7個師團，很明顯的，主作戰已轉移至華中，形成敵我主力對決的狀態。¹⁰日軍增兵的結果，主力南移，戰事擴大。國軍達成會戰目的，替持久戰開創有利機勢。

11月6日日本第10軍以所屬第6師團、第18師團從杭州灣登陸，威脅國軍側背。

當時軍委會以滬戰為國際觀瞻所繫，九國公約國正在布魯塞爾開會討論日本侵華問題，準備再支持3日，企望以國軍的英勇奮戰爭取國際支持，影響會議結論。待發現有被敵包圍的危險時始決定轉進，當時部隊秩序已亂，命令不能順利下達，¹¹國軍在指揮掌握極度困難的情況下撤出淞滬地區，人員及裝備的戰損重大。此役戰況慘烈，國軍有全營、全團奮戰犧牲者，有精銳師級部隊僅餘3~4千人者，傷亡官兵總計33萬3千餘人。

後人研究本次會戰時，曾討論國軍集中最大兵力以攻勢行動投入戰場，在抗戰初起就採取幾近決戰的軍事行動，是否將影響持久戰的遂行。然就當時情況，面對戰力強大的日軍，為達成會戰目的，非如此不足以迫其增兵。「兵無常勢，水無常形。」¹²以攻勢手段達成持久目的亦符準則要求。而且當時仍有改取守勢及逐次抵抗的預備計畫，陣地構築亦先期完成，端視戰況不利時能否適時轉進再戰，國軍的會戰計畫允為至當。惟國軍在會戰中寸土必爭，犧牲慘重，適與我們標舉持久抗戰的決策背道而馳；¹³在外交上，九國公約國做何決定，非我所能掌握，而我軍處境危險，已有被殲之慮，若不重新調整戰線，則為「以不一定可能獲得之利，欲抵銷極可能之害，是戰略上的冒險與錯誤

8 《中國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作戰記》上冊，頁548。

9 《從日俄戰爭到盧溝橋事變》，頁713。

10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日軍對華作戰紀要叢書，《從盧溝橋事變到南京戰役》初期陸軍作戰(一)(臺北：國防部史編局譯印，民國76年6月)，頁559。

11 何智霖編輯，《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新北市新店：國史館，民國93年)，頁58。

12 齊衛國編著，《實用孫子兵法》(臺北：黎明文化公司，2001年5月)，頁97。

13 《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頁65。



。」¹⁴難免觸犯孫子「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¹⁵的警語。本次會戰，國軍在戰略上成功，戰術上失敗。

會戰開始後，8月14日《紐約時報》報導上海有日僑5,000人無法棄置不顧，日本從華北抽兵亦不可能，增兵上海則其兵力必須相當大，方能應付蔣所部受過德式訓練的精銳之師；並載有8月13日東京通訊：「上海局勢之展開，將強迫日本政府考慮在中國兩個前線作戰……此事卻給中國政府一個機會去攪亂日本在華北的戰略。」8月14日《東京電訊》包括下列揣測：

「此間極端的猜疑南京政府已決計將日本捲入華中軍事之中，以分散其兵力，並增加其對各國產生糾紛之可能。……滿載文書檔案之輪船數艘業已離京，現在揚子江之途中。」¹⁶

民間媒體都看得出國軍的會戰目的在強迫日軍增兵上海，造成其兵力分散，形成華北、華東兩個戰場；也注意到國軍發起攻擊時，資材同時在進行撤離。上海擁有全國半數以上的製造工業，抗戰初起，政府立即籌備遷移該地工廠，長江和鐵路的交通阻滯，敵機不斷轟炸，工廠員工冒生命危險拆卸機器。搬運材料時，多賴木船沿內河輾轉向上游輸送，先至武漢再西移鄂西、四川，南移湖南，北移陝西，¹⁷武漢成為抗日戰爭時，工業產能及戰略資

材向後方大遷移最重要的轉運中心。淞滬會戰長達3個月，爭取到疏遷所需時間，對民用軍需等生產力在後方重建的貢獻至大。

當時，共產黨已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另立中央，形成國中有國；而國內其他地區僅為名義上的統一，地方派系各擁勢力，未必全聽中央號令，各級政府組織鬆散，地方制度未上軌道，胡適形容當時的中國為中世紀。此為中央政府深存顧慮，而未能儘早決定抗日的重要原因。蔣委員長當時的心境寫照，如26年8月5日的日記，曰：

「夫倭寇乃有組織之國家，一下全國動員令，則人人能發揮作戰效用，我則無組織之國家，事事皆由余一人任之，以一人而敵彼之全國，可不懼乎！」¹⁸

當時地方勢力的心態，如「盧溝橋事變」時，第29軍宋哲元不戰撤出北平，起初不要中央軍來援，迨受日軍攻擊，又嫌中央軍來得慢；北平失陷後，察哈爾省主席劉汝明不願湯恩伯所部入察支援，因懼日軍為此而攻察；河北省主席馮治安不要關麟徵等部入冀作戰，亦不允許關部第25師趕築防禦工事。當時的分據局面，代理蔣委員長指揮第一作戰區作戰的石家莊行營主任徐永昌，且歎：

「懼日又不能不抗日，疑中央又

14 國防大學戰爭學院的名言。

15 《實用孫子兵法》，頁45。

16 黃仁宇著，《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臺北：時報文化出版社，2011年10月11日，二版），頁175。

17 郭廷以著，《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1979年），頁696。

18 黃自進、潘光哲編，《困勉記》下冊（臺北：國史館出版，2011年12月），頁570。

不能不賴中央，今日中國之擁有重兵者，無不然也？危哉。」¹⁹

國民政府決心全面抗日，發動淞滬會戰時調動最大兵力向上海集中。終在民族大義的號召下，桂、粵、滇、川，湘等部隊，不分派系及地域齊赴戰場，一致抗日。收到破除割據，團結內部，統一號令的效果。

國軍奮勇作戰及壯烈犧牲亦贏得舉世注目，國際聯盟特予重視國軍持久作戰的戰力。²⁰許多國家也改變「九一八事變」以來認為中國軍隊不敢打、不能打的看法，對抗戰的正面影響甚大。國軍的勇猛頑強及精良戰技亦使日軍參謀本部大感震撼，甚至有人主張修改制服，因為日軍制服上的明顯標幟屢為國軍射擊的瞄準點。10月2日其陸軍部軍事課長田中新一，有如次的手記：

「在上海作戰的中國軍的抗戰意志及其步兵的戰鬥力實出乎陸軍部意料之外。……中國軍的步兵戰術之要訣為，黏住日軍步兵戰線，一黏住日軍的步兵戰線不但可避免日軍的遠戰武器的砲轟擊，且可高度發揮其有信心的近接武器、曳火手榴彈及迫擊砲等的效果；其步兵戰術可說是，捨身進入死地爾後求生。中國軍步兵的狙擊可說是他們的特別技能，日軍軍官經常成為其狙擊的理想目標，尤其軍官的肩章、參謀飾總、長靴及軍帽等

成為其射擊目標，因此，有人主張修改制服。」²¹

當時國軍的武器裝備雖然遠不如日軍，但戰鬥力佳，抗日意志堅強，在淞滬會戰得到印證，並獲得敵人的重視。當戰火從華北蔓延至上海，一再的反覆激烈戰鬥，迫使日本政府逐漸進入戰時體制；在8月下旬的內閣會議中決定了國民精神總動員實施要綱，並於9月4日召開第72次(臨時)議會，準備建立戰時體制。開會式當天的天皇詔書具有對中國宣戰的性質：

「帝國與中華民國互助合作，確保東亞之安定，以收共榮之效為朕夙夜軫念之所在。中華民國未深切瞭解帝國之本意，動輒引起事端，以至演變為本次事變，朕引以為憾。如今朕要求軍人排除萬難以盡忠勇，此無他，端為促使中華民國反省，以迅速建立東亞之和平。」²²

首相近衛文磨的施政報告表明了日本的態度，其主要內容如次：

「作為遂行此一基本方針的手段，過去政府儘可能在防止事件之擴大，並限定局面以努力於收拾事態，但中國方面卻乘帝國政府之隱忍，益形高漲其侮日抗日之氣勢，使局面終於波及到華中。至此政府認為不可能再以像過去的消極而局部性的作法收拾事態，遂不得已斷然的積極而全面性

19 徐永昌著，《徐永昌日記》，冊四，26年8月11、12日記。轉引自蔣永敬著，《抗戰史論》(臺北：東大圖書發行，民國86年10月)，頁285。

20 陶希聖著，《中華民國抗日戰爭史論》(臺北：中國大陸研究出版社，民國73年12月)，頁5。

21 《從日俄戰爭到盧溝橋事變》，頁727。

22 《從日俄戰爭到盧溝橋事變》，頁707。



的作法，欲給予中國軍一大打擊。」

又曰：「今日帝國所應採取之手段，乃儘速給予中國軍徹底的打擊，使其喪失戰志，別無他法。如此倘尚未能促使中國當局反省，而繼續其執著的抵抗時，帝國亦當不惜遂行長期作戰。」²³

日本的動員及近衛的報告，證實淞滬會戰促使日本進行總動員，進入國家戰時體制，並於11月17日設立大本營，係戰爭指導之統帥機構；對華軍事從不擴大事態轉為不惜長期戰爭，從此陷入中國戰場的泥淖。這次會戰，對我國的抗日戰爭及世局發展都做出重大貢獻。

二、徐州會戰的延續

民國27年3月中旬的徐州會戰，係經由淞滬會戰所帶動的又一次會戰。國軍主力在淞滬會戰結束，南京失守後，控制在武漢外圍及豫皖邊區進行整補並加強魯中、淮南的力量。日軍上海派遣軍和第10軍在淞滬會戰末期為統一指揮，併編為華中方面軍，27年2月18日又改編為華中派遣軍。此時中日兩軍的主力概在華中，這個廣大區域最重要的戰略重鎮是徐州，徐州位於隴海鐵路及津浦鐵路交會點，為兵家必爭之地。日本華北方面軍認為攻占徐州可打通華北方面軍與華中派遣軍的連絡線，並可繼淞滬會戰之後一舉擊滅國軍主力；基於此，策劃以華北、華中兩軍分由南北取攻勢，會師徐州圍殲國軍的作戰計畫。但日軍大本營的看法自又不同，認為目前日軍戰力整備不足，武器、彈藥、器材等嚴重短缺，動員兵力尚待編訓，對中國作戰及防備俄軍乘隙南下的準備均未完成

，時下應以整建戰力為主，故持保留態度。參謀本部第一部長橋本，回憶昭和13(民國27，公元1938)年2月11日的省部會議〔筆者註：係內閣諸省(部會)與參謀本部主要幕僚之聯席會議〕：

「漢口作戰的方法，有南下平漢鐵路及溯長江的兩個方法，但兩種均屬兵力不足。又如前所述，當時現地軍有意見欲貫穿津浦鐵路(筆者註：指發動徐州會戰)；這種構想並非參謀本部的想法，其為解決中國事變而達成大局目的之意義不大，且為確保亦將吸收相當之兵團。故此際應以不擴大戰爭面為方針而從事軍備工作，而實施對解決事變有貢獻的作戰為宜，也因此在這方面進行必要之研究。其結果認為於昭和13年從事於整備工作，且不擴大占據地域而儲蓄彈性力量，而準備於昭和14年徹底進行積極作戰，以一擊導向於解決事變為上策。」²⁴

日本省部會議的內容，顯示大本營此時已經在研議進兵武漢的問題，策劃以1年從事戰力整備再發動攻勢，不希望現在中國戰場再生事端。省部會議所講的兩條作戰線，仍然是日俄戰爭以後所決定的侵華路線，並沒有改變。

發動徐州會戰係日軍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寺內壽一所堅決主張，認為應乘國軍淞滬會戰新敗，尤其國軍中央軍最精銳的6、7個師大部分喪失戰鬥力的時機，「使華北、華中連接起來，進行徐州會戰」，說明這是「追剿眼前之敵，決不是深入南

23 《從日俄戰爭到盧溝橋事變》，頁708。

24 《從日俄戰爭到盧溝橋事變》，頁796。

進作戰。」²⁵其意見得到大本營主戰派的支持，認為這是給國軍主力一打打擊，挫折國軍抗戰意志的大好機會，遂決定實施徐州會戰。會戰以擊滅國軍有生戰力為目的，見4月7日陸軍命令第84號第一條：「大本營計畫擊破徐州附近的敵軍。」²⁶

國軍在會戰直前的臺兒莊作戰重創日軍，為日軍侵華以來最重大的勝利，提振了全國民心士氣，打破日本標榜皇軍不敗的神話，國際對中國終將獲得最後勝利的看法視為可能。會戰開始後，國軍不待日軍完成包圍，適時向豫東轉進，日軍未能達成擊滅國軍的會戰目的。當時日軍尚未完成擴軍計畫，無法從國內抽調兵力支援，為遂行徐州會戰，在中國總共15個師團中，調至徐州參戰約10個師團，仍不足以完成圍殲徐州附近50～60萬國軍的任務。²⁷而其在華總兵力的三分之二都集中在華中地區，主力已徹底南移。

徐州會戰後，日軍進攻武漢的期程提前於27年6月實施。大本營陸軍部最初的作戰計畫，分以1個軍沿平漢線南下及1個軍沿長江西進兩案，但華北方面很難再抽調兵力沿平漢線南下作戰，故中止前案；改為決定主力沿淮河進攻大別山系以北地區，另以1個軍沿長江進攻，亦便於華中

派遣軍統一指揮。²⁸6月12日黃河花園口潰決造成淮河氾濫，日軍認為主力利用淮河水運前進有困難，又決定主力沿長江前進，²⁹一部沿大別山北麓進攻；華北方面軍則協力華中派遣軍對武漢的作戰，以一部兵力前進鄭州，牽制敵軍。³⁰至此，日軍侵華的作戰線已經放棄從北向南，沿平漢線取攻勢的方案。時任軍委會參事室主任，參與軍政機要的王世杰，27年6月15日的日記：

「據何敬之(筆者註：何應欽，當時身兼軍委會參謀總長及軍政部長。)在國防最高會議報告，敵軍移調長江方面作戰者已有七、八師團之眾。敵軍初意或擬一面由隴海路取鄭州，一面由合肥進取信陽，因以威脅武漢。但自黃河在中牟附近決口後，敵軍在隴海線已無法西進。現時敵軍作戰計畫，似係沿長江西進，並趁此水漲時，發揮其海陸空軍之聯合力量。」³¹

從日軍作戰計畫的調整與何應欽敵情報告相互參照，日軍主力已經改為沿長江進攻武漢，平漢線方面改取守勢掩護北翼安全，國軍達成導引日軍作戰線改變的戰略目標。

25 《中國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作戰記》上冊，頁682。

26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日軍對華作戰紀要叢書，《華中華南作戰及對華戰略之轉變》初期陸軍作戰(二)(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印，民國76年7月)，頁66、67。

27 《中國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作戰記》上冊，頁744。

28 《華中華南作戰及對華戰略之轉變》，頁171。

29 《華中華南作戰及對華戰略之轉變》，頁172。

30 《華中華南作戰及對華戰略之轉變》，頁173。

31 王世杰著，《王世杰日記》冊一，頁284、285。轉引自蔣永敬著，《抗戰史論》(臺北：東大圖書發行，民國86年10月)，頁327。



日軍為發動徐州會戰，主力南移，華北空虛，造成中共發展根據地的極佳機會。毛澤東曾說：「日軍將華北兵力集中於徐州，華北占領地就出了大空隙，給予游擊戰爭以放手發展的機會。」³²中共利用這個機會積極擴張，是抗戰勝利後在華北勢力龐大的主要原因，對戰後的中國局勢影響深遠。

三、關鍵因素的評述

日軍在淞滬會戰和徐州會戰都獲得勝利，因此，亦有不認為追隨國軍行動這件事。戰爭本來就是交戰雙方互相爭取主動的過程，被動的一方，有時是被迫，有時是被誘，日軍兩者都是。被迫易生警覺，被誘則產生錯覺；被誘者常誤認為自己正在掌握主動，實際上是在追隨對方行動而不自知，這是戰爭之霧所造成的戰場心理。

國軍發動淞滬會戰，如前述8月14日《紐約時報》的報導，上海有日僑5,000人無法將之棄置不顧(筆者按：上海及長江沿岸的老弱婦孺在戰前均已撤回日本，但將適戰青年及在鄉軍人約10,000人留滬，準備必要時讓他們參加上海作戰。³³留在上海的平民應是這部分人員)。而且依當時情況，日本駐紮上海的7,000陸戰隊員若得不到增援，必被國軍全部殲滅；若陸戰隊撤退，等於放棄在上海的侵略利益，包括租界、駐軍、上海商務及戰艦停泊等。上海是國際都市，各國租借的所在地，以當時日本的氣焰，考量上海利益、國際觀瞻及對中日兩國民心士氣的消長，也

不可能做這樣的事，增兵成為唯一選擇。因此，編組上海派遣軍到滬作戰是被迫，亦為維護上海的既得利益所誘；當上海派遣軍戰況不利，要求支援時，若不增兵也有被國軍殲滅之虞，不得不再從華北抽調部隊，編組第10軍增援上海，這也是被誘迫。

淞滬會戰持續擴大，造成中日雙方主力都集中在華中。國軍會戰目的在擴大戰事以吸引日軍南下，所以，掌握到主動；日本對華政策為「戰局不擴大」，不斷增兵上海則為追隨國軍行動，處於被動地位。淞滬會戰的發展，又帶動另一次的徐州會戰，在華日軍主力進一步南移華中，繼續追隨國軍意志。

擊滅敵軍主力為軍事指揮官最企望的目標，拿破崙語：「歐洲名將甚多，他們注意的目標太多，我只注意敵軍主力。」這是戰場用兵的重要原則，但仍須服膺國家戰略及軍事戰略的指導。1866年普奧戰爭，普魯士在凱尼格拉茲會戰(亦稱薩多瓦會戰)擊敗奧軍，此時普軍距離奧國首都維也納不過10公里，普軍並未乘勝進擊奧京，也未要求割地賠款。反而以寬大的條件簽訂合約，係著眼於在下次對法作戰時，奧國能保持中立。普軍配合政策而克制軍事行動，到1870年普法戰爭時，奧國遵守中立，普軍終能戰勝強敵，達成建立德意志帝國，完成統一的國家戰略目標。

日軍大本營同意發動徐州會戰，企圖圍殲淞滬會戰新敗的國軍主力，則為眼前的戰場利益所誘，而忽視「戰局不擴大」

32 《毛澤東軍事文集》，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二卷第334頁。轉引自《中國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作戰記》上冊，頁745。

33 《中國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作戰記》上冊，頁511。

的國家戰略，未遵循先整備戰力再進軍武漢，進行所謂「一擊」的軍事戰略，因此，多打了一場效果不大的會戰。日軍主力更加集中於華中的結果，導致爾後策劃武漢會戰時，華北兵力不足，不得不放棄原來可沿平漢線由北向南的作戰線，改變為溯長江由東向西仰攻。日軍的被動係沿自於淞滬會戰延續到徐州會戰所產生的連鎖效應。這時期的作戰，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所編纂的「日軍對華作戰記要叢書」，在結語中有如次記述：

「且在不得已之狀況派兵至當時最不願意派兵之上海方面，以後也未能在此一方面給予敵人重大的打擊，而且，逐次被吸引兵力以消耗戰力；其戰區與投入之兵力一直擴大下去。」³⁴

日軍的「不得已之狀況」，係受制於國軍的壓迫殆無疑問。「逐次被吸引兵力以消耗戰力，其戰區與投入之兵力一直擴大下去」，正是追隨國軍行動的結果。戰爭是雙方智慧與意志的對抗，亦是錯誤的累積，錯誤有時係自己所造成，也往往被敵人的作為所帶動而造成。富勒(J.F.C.Fuller)說：「在戰爭中常常會有這種無法計算的事件發生，而它們卻往往足以決定國家的命運。」³⁵

戰略指導的論證

淞滬會戰國軍以攻勢爭取主動，在上

海擴大戰事，逐次增兵，誘迫日軍主力從華北轉移到華中，溯長江進攻武漢是歷史所呈現的事實。然國軍的戰略指導從何產生，形成的過程如何，誠如李德哈特所講，影響力究竟是什麼？原始原因又是什麼？從這些根源去探索，則脈絡更見清晰，史證更為明確。

一、軍事思想的影響

思想產生力量，影響行動。軍事的原理原則雖然普世通用，而各國的軍事思想，作戰方式及慣用戰法，則各有其經由戰爭所鍛造的特質。民國建立以來，國軍歷經東征、北伐兩次重大戰爭，用兵思想概已建立，抗日是第三次重大戰爭，國軍已經是一支有歷史傳統，有作戰經驗的部隊，抗日時期的用兵才會有傳統的色彩與經驗的鑿痕。

追溯國民革命軍的建軍史，用兵思想經由史政歸納：在民國15(1926)年北伐時期的用兵思想包括「戰爭線的爭取及轉移」與「戰場形勢的操縱及控制」。在戰爭線(現在稱為作戰線)轉移的戰例，北伐軍進攻兩湖之初並未從廣東由南向北仰攻，而是策動第9、第10兩軍繞攻鄂西，攻占湖北後始轉為由西向東，據地形之利直下江西，進取安徽，攻略京滬；在戰場形勢操縱的戰例，北伐軍在戰爭進行中始終掌握主動與攻勢，如迅速對吳佩孚展開攻擊，逼得吳不得不親率主力南下。³⁶比北伐更早的東征時期，歸納其用兵思想得到三

34 《從盧溝橋事變到南京戰役》，頁711。

35 富勒(BY J.F.C.FULLER)著，鈕先鍾譯，《西洋世界軍事史》(A Military of the Western World)(臺北：軍事譯粹社，民國65年12月再版)，頁129。

36 歸納自國防部史編局，《國民革命建軍史》第一部：建校建軍與東征北伐(臺北：國防部史編局編印，民國81年2月28日)，頁733。



點結論：「發揚革命精神」、「把握主動」、「紀律嚴明」。³⁷

我國從推翻滿清建立民國，歷次作戰都是劣勢對抗優勢，特重以精神戰力彌補物質戰力的不足，以紀律嚴明團結內部，集中力量；在具體作為上則力求保持行動自由，形成局部優勢爭取先制，變不可能為可能，所以能以寡擊眾，以弱勝強。東征時期的用兵由第一次到第二次東征的共同點均為對敵採取主動攻擊，絕不坐視敵集中後始出擊。蔣委員長曾說：「藝術化的奇妙，雖然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河江，但是要領只有一個，就是主動。」本時期三次戰役所以能順利成功，「先發制人」的主動精神占很大關係。³⁸

抗日戰爭改變日軍作戰線的想法，有如北伐時期先進攻兩湖再南下江西，都是作戰線轉移的觀念；而發動最大兵力猛攻上海，迫使日軍主力調集華中，則類似以攻勢行動迫使吳佩孚主力南下的先例。北伐為當時黃埔軍校校長蔣中正所領導，以黃埔師生所編成的部隊為主幹，到抗戰時期，北伐的黃埔師生已經是抗日的國軍將校，他們在戰火中淬鍊出共同的經驗，面對比軍閥更強大的日軍，在用兵思想上有其脈絡可循。淞滬會戰的指導，國軍以爭取主動的傳統精神及改變作戰線的實戰經驗，發揮抗日救國的精神因素，以嚴明的紀律奮戰不退，終能達成在華中擴大戰事及改變日軍作戰線的任務，其力量根源係

來自於國軍軍事思想的啟迪。

二、重要文獻的佐證

國軍迫使日軍改變作戰線的動念甚早，抗戰時期的日記和回憶錄透露這是早期就有的戰略預案，在民國24年決定以四川為抗日基地時就開始醞釀。蔣委員長表示：

「自從『九一八』經過『一二八』以至於長城戰役，中正苦心焦慮，都不能定出一個妥當的方案來執行抗日之戰。關於如何使國家轉敗為勝轉危為安，我個人總想不出一個比較可行的辦法。祇有忍辱待時，鞏固後方，埋頭苦幹。但後來終於定下了抗日戰爭的根本計畫。這個根本計畫什麼時候才定下來的呢？我今天明白告訴各位，就是決定於24年入川剿共之時。到川以後，我才覺得我們抗日之戰，一定有辦法。因為對外作戰，首先要有後方根據地。……到了24年進入四川，這才找到了真正可以持久抗戰的後方。」³⁹

24年8月峨嵋軍訓團開訓時，7日的日記，曰：「近日對抗戰計畫思慮深長，然猶未能得結論也。」8日研究治國整軍，曰：「思慮頗有所得也。」9日曰：「對倭作戰之決心既定，自可轉入主動地位矣。」⁴⁰21日晚與孔祥熙、宋子文商談經濟戰的準備以後，研究日本失敗，曰：「其失敗，當在10年之內，而我之準備，可依

37 《國民革命建軍史》第一部，頁421。

38 《國民革命建軍史》第一部，頁421。

39 蔣中正，〈國府遷渝與抗戰前途〉，民國26年11月19日，見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14，頁653。

40 黃自進、潘光哲編，《困勉記》上冊（臺北：國史館出版，2011年12月），頁462。

此而定也。」⁴¹此時對「基地」和「持久戰」的問題應該都有了腹案。

這段時間的日記有兩點值得觀察，一是決心篤定後，第一個產生的意念就是要爭取主動。蔣的日記多次提到主動，這是國軍從東征、北伐到抗日一貫的用兵特色。現在國軍的戰爭十大原則，第一條講目標，第二條就講主動，係歸納歷次作戰經驗的心得，成為國軍重要的歷史資產。另一點是指示孔、宋在財經上要有長期抗戰的準備，日記透露此時已經有進行10年持久戰的打算。國家準備戰爭，不僅對財經，對其他軍事、內政、外交、社會、民心及動員等都會有所指導。有關對作戰線的看法，時任山西省主席的徐永昌，在民國24年10月15日的日記提到：

「蔣先生看定日本是用不戰屈中國之手段，所以抱定戰而不屈的對策。前時所以避戰，是因為與敵成為南北對抗之形勢，實不足與敵持久。自川黔剿共後，與敵為以東西對抗，自能長期難之。」⁴²(如附件)。

當時知道蔣委員長想法的當不只徐一人，徐的日記證實，民國24年國軍內部已經在討論作戰線問題。日記另發現，蔣委員長所以未能更早決定對日抗戰，除戰爭準備不足，國內號令尚難統一，國際局勢未必有利等原因外，與日軍南北對抗的作戰線不利也是重要因素，順其發展不是蔣的個性。

民國25年是中央政府以抗日為中心工作的一年。陳誠回憶：

「民國25年10月因西北風雲日緊，我奉委員長電召由廬山隨節進駐洛陽，策劃抗日大計，持久戰、消耗戰、以空間換取時間等基本決策，即均於此時策定。至於如何制敵而不為敵所制問題，亦曾初步議及。即敵軍入寇，利於由北向南打，而我方為保持西北、西南基地，利在上海作戰，誘敵自東而西仰攻。關於戰鬥序列應依戰事發展不斷調整部署以期適合機宜……。」⁴³

洛陽所策劃的抗日大計，改變日軍作戰線已經成為戰略預案。從洛陽決策看戰略問題，持久戰、消耗戰、以空間換取時間是抗日全局的指導，屬於國家戰略的範疇；在上海吸引日軍主力南下，擴大戰事以分散敵軍，是支持國家戰略的軍事戰略；作戰線的選擇，係用兵上能否有利於達成作戰任務的野戰戰略問題。當以四川為基地，無論要在華中擴大戰事或改變日軍由北向南的作戰線為由東向西，都必須迫使日軍到上海作戰。因此，在擴大戰事和改變日軍作戰線這兩者，若從不同的戰略層次看問題，著眼或許有點不同，但手段相同，在執行上是同一件事。由於作戰線的軍事專業性較高，一般的學術研究通常講擴大戰事，少提作戰線，所以，現有的資料缺乏，後人產生疑慮在所難免。不過從徐永昌日記及陳誠回憶錄提到的洛陽抗日大計，足以證明在決定以四川為抗日基地後，民國24、25年國軍已經產生導引日軍改變作戰線的想法及戰略預案。那時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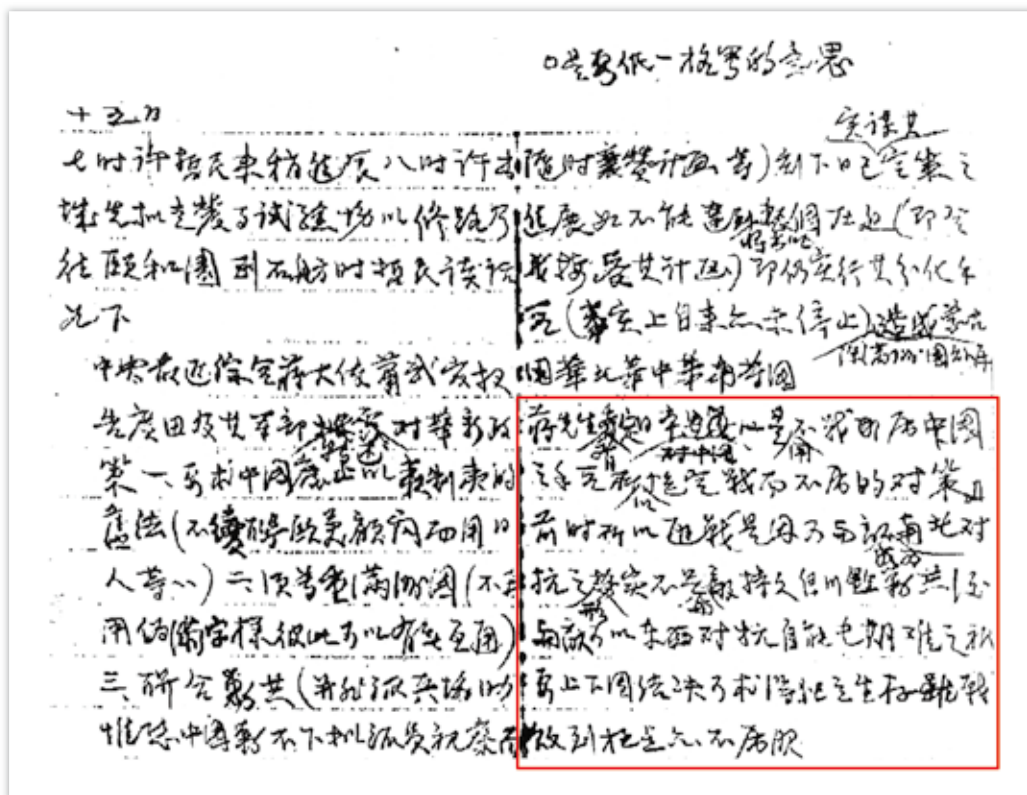
41 《困勉記》上冊，頁464。

42 徐永昌著，《徐永昌日記》第三冊(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印)，頁318。

43 《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頁23。



附件



資料來源：作者摘錄史料。

國還在戰爭準備時期，何時導引日軍到上海作戰，還得視中日關係的發展而定。

26年8月淞滬會戰初起，18日陳誠與熊式輝奉命共同視察上海，回南京報告時仍有戰、和兩種不同意見，陳主戰、熊主和。蔣委員長徵詢陳誠意見時。陳建議：

「敵對南口在所必得，同時亦為我所必守，是則華北戰事擴大，已無可避免。敵如在華北得手，必將利用其快速部隊，沿平漢路南犯，直趨武漢；如武漢不守，則中國戰場縱斷為二，于我大為不利。不如擴大淞滬戰

事，誘敵至淞滬作戰，以達成我25年所預定之戰略。」⁴⁴

並建議「若打，須向上海增兵」，蔣立即同意，大戰於焉展開。淞滬會戰期間，華北亦進行平漢、津浦路北段，晉北，太原等作戰。中日戰爭形成華中、華北兩個戰場。9月2日蔣委員長日記，研究戰略，曰：

「敵之戰略，其弱點，乃以支戰場為主戰場。……使彼愈進愈窮，進退維谷，不難曠日持久，以達我持久抵抗之目的。」⁴⁵

44 《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頁34。

45 黃自進、潘光哲編，《困勉記》下冊(臺北：國史館出版，2011年12月)，頁575。

當時的戰場景況有兩種說法，一為陳誠(時任淞滬會戰前敵總指揮)回憶：「8月22日晚，日軍增援來滬的第3師團、第12師團及另兩個旅團，於多點強行登陸，滬戰的局勢益形擴大。」⁴⁶另一為郭汝瑰(曾任國軍參謀本部作戰次長)以日方資料整理：「8月18日第3師團的半數及第11師團均已緊急動員完畢，決定分兩批由海軍向上海輸送，第3師團的另一半於28、29日直駛上海。」⁴⁷兩者說法或有部分出入，都證明華中戰事開始擴大。其後，日軍增援上海派遣軍第3個師團101師團，其先遣又在9月22日到達上海，開始猛烈攻擊，⁴⁸其主力在22~27日這5天時間，應該陸續抵滬加入戰鬥，使戰事更加擴大。蔣委員長9月27日的日記所載，是從戰略上對戰局發展的看法。曰：

「引其在南方為主戰場。」⁴⁹

迄至11月6日，日軍再以兩個師團於杭州灣登陸，於是，在我卓越的戰爭指導下，日軍不得不將侵華主力集中到淞滬地區，將其由北向南的作戰線扭轉為由東向西的戰略基礎工程，終告奠定。

結語

日本侵華計畫，早在日俄戰爭後的帝國國防方針就開始策訂。其範圍除滿洲外，以華北為主，包括華中及華南沿海，作戰目標遠及武漢。計畫中列舉沿平漢鐵路南下及溯長江西進這兩條作戰線，在民國14年對長江水道從上海到漢口段就已經完

成偵察。民國27年武漢會戰時，擔任作戰指揮的華中派遣軍司令官畑俊六大將，就是13年前領隊偵察長江沿岸的那位大佐。日本侵華處心積慮，從作戰計畫、戰地偵察到幹部培養都有長期規劃。

民國以來，日軍從東北、華北一路向南蠶食，其主力在北。爾後行動若繼續由北向南，沿平漢線直取武漢的態勢自然，此案可迂迴國軍後方，迫國軍於不利狀態下決戰，並分斷中國為東西兩部，使華中的工業生產設備及戰略物資不及搬遷，嚴重影響我戰爭潛能。國軍誘迫日軍主力改為沿長江由東向西進攻，則可在掩護補給線安全及資材後撤路線的情況下遂行持久作戰，對抗日戰爭的全局影響至巨。民國26年8月國軍集中最大軍力，以攻勢發動淞滬會戰，導致戰事擴大，迫使日軍主力從華北轉移到淞滬地區；再經27年3月的徐州會戰，日軍總兵力的三分之二已經全部南下，華北方面不足以編組有力兵團進行攻勢作戰。爾後即由華中派遣軍由東向西，溯長江仰攻武漢。戰史呈現日軍追隨國軍行動，從而改變作戰線的事實。

國軍的作為，其影響力的根源出自東征、北伐以來的國軍軍事思想，係用兵學能的發揮與作戰經驗的心得。從當時有關重要人士之日記及回憶錄等重要文獻的記載，呈現蔣委員長決定以四川為抗日基地以後，在民國24年10月15日以前就提出「與敵南北對抗，實不足以與敵持久，與敵東西對抗，自能長期難之」的看法；25年

46 《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頁53。

47 《中國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作戰記》上冊，頁538。

48 《中國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作戰記》上冊，頁559。

49 《困勉記》下冊，頁578。



在洛陽策劃抗日大計時，持久戰、消耗戰、以空間換取時間等基本決策均在此時決定，並討論到導引日軍到上海作戰，誘敵由東而西仰攻的戰略。26年8月在上海發動會戰，是為了落實25年所議定的戰略，並在會戰中貫徹執行。相關文獻證實，這個構想從產生概念、訂為戰略到具體實踐，前後歷時兩年，不是會戰發動後的臨機因應。時值淞滬會戰75週年，緬懷先烈忠勇，景仰前輩智略，為文以示崇敬。

參考文獻

- 一、《困勉記》上、下冊(臺北市：國史館出版，2011年12月)。
- 二、《抗日戰史 淞滬會戰》1~3冊(臺北市：史政編譯局編印)。
- 三、何智霖編輯，《陳誠先生回憶錄 抗日戰爭》(上)(臺北縣新店：國史館，民國93年)。
- 四、李德哈特(B.H.Liddell Hart)著，鈕先鍾譯，《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史》(Hist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臺北市：軍事譯粹社印行，民國68年3月)。
- 五、約米尼(Antoine Henri Jomini)著，鈕先鍾譯，《戰爭藝術》(Summary of The Art of War)(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2002年1月)。
- 六、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1979年)。
- 七、郭汝瑰、黃玉章主編，《中國抗日戰爭 正面戰場作戰記》上、下冊(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
- 八、《徐永昌日記》第三冊(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印)。
- 九、陶希聖著，《中華民國抗日戰爭史論》(臺北市：中國大陸研究出版社，民國73年12月)。
- 十、國防部史編局編，《國民革命建軍史》第一部：建校建軍與東征北伐(臺北市：國防部史編局編印，民國81年2月28日)。
- 十一、《國民革命建軍史》第三部：八年抗戰與戡亂(一)(臺北市：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民國82年1月)。
- 十二、曹聚仁著，《蔣百里評傳》(北京：東方出版社，2010年1月)。
- 十三、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從日俄戰爭到盧溝橋事變》大本營陸軍部(一)(臺北市：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印，民國78年6月)。
- 十四、《從盧溝橋事變到南京戰役》初期陸軍作戰(一)(臺北市：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印，民國76年6月)。
- 十五、《華中華南作戰及對華戰略之轉變》初期陸軍作戰(二)(臺北市：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印，民國76年7月)。
- 十六、黃仁宇著，《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臺北市：時報文化出版社，2011年10月11日二版)。
- 十七、蔣中正〈國府遷渝與抗戰前途〉，民國26年11月19日。
- 十八、蔣永敬著，《抗戰史論》(臺北市：東大圖書發行，民國86年10月)。
- 十九、富勒(J.F.C.Fuller)著，鈕先鍾譯，《西洋世界軍事史》(A Military of the Western World)(臺北市：軍事譯粹社，民國65年12月再版)。
- 二十、齊衛國編著，《實用孫子兵法》(臺北市：黎明文化，2001年5月)。